

◆ 安庆地理

黄梅山札记

章宪法

黄梅山在安庆城西北，车程大约三十公里。阮自华写过一首《出集贤门道高桥莲花铺至石境山庄抵雾灵作》，诗题中的“高桥”“莲花铺”“石境”“雾灵”等地名，串出的是明代进出安庆城的陆路干道，大致走向与出城的国道差不多。阮自华写的也是“国道”，驿道转向东北，便经桐城、庐州、凤阳抵达京师；驿道转向西南，便经潜山、太湖、宿松进入江西、湖广。

阮自华的宅第，在安庆府城天台里。阮自华自号“雾灵山人”，著有《雾灵集》。顾祖禹《读史方輿记要》云：“雾灵山在府城（安庆城）西。”研究阮大铖戏曲时，误以为雾灵山在安庆城“西”部，数度寻觅皆无所获。后经张全海博士指正，方知雾灵山即黄梅山，在城外四十里的怀宁县石镜乡境内。旧时安庆府与怀宁县府县同治，顾祖禹的“西”原来是西面。

阮自华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崇祯三年（1630）辞官归里，宦海三十余年，政绩甚为平淡。依《阮氏宗谱》所载，阮自华系“竹林七贤”中阮咸的后裔。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载：阮自华“为人跌宕疏放，好从学佛者游。嗜酒，为长夜之饮”。家风也是阮自华的风格，拜谒上司时，阮自华不仅酒气冲天，还将酒菜吐到上司的官服。终其一生，阮自华都没有更改风流文人的禀性。

在沿江低山丘陵中，黄梅山体量较大，地涉两乡五村，方圆数里，有峰有峦，相对高度约在300米。龙凤水库在黄梅山西北，大坝连着一道山道，宽数尺。山道蜿蜒至山腰，一块平地豁然而出。当地大塘村的蒋伟先生说，这就是阮自华所建黄梅庵的遗址。这是一个峰峦环抱之所，山凹东向，庵门北向，与民间建筑习俗正好相反。遗址前后深数丈，两端延伸有数十丈。修竹高耸，落叶安静而干净。当年的黄梅庵，选的是人间一方净土。

《抱朴子》云：“开源不亿仞，则无怀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则无弥天之云。”黄梅山完全颠覆了，源不长而溪流不断，少崇峻而云来雾往。黄梅山顶有天池，《怀宁县志》载，天池吐雾则必降雨，颇为灵验，黄梅山又称“雾灵山”。黄梅山之名，又从何而来？引导我们探山的蒋南才老人说，黄梅庵前曾有一棵古黄梅树，是从

朝鲜运过来的，后来被人偷挖走了。果然，树没，坑仍在。黄梅山之名，最早见于明天顺六年（1462）的《直隶安庆郡志》，时间在建黄梅庵之前，黄梅山当有更远久的故事。

明季的黄梅山，是阮自华长期活动的“道场”。除了黄梅庵，阮自华还建有“石濂阁”与别业“石镜山庄”，皆距此不远，均不存。黄梅庵遗址上，石构件累累，一块石匾上，“泰昌年立”字样清晰可见。

阮自华生活在黄梅山，“泰昌年”前有三十余年，“泰昌年”后有二十余年。阮自华于此创办了“声伎家班”（阮家班），搬演戏剧，一时声名遐迩，攘攘兮名流纷至。随行的文友，问及黄梅戏与黄梅山的关联。张博士认为，以现有史料尚不足以作出定论。有一点可以肯定，黄梅戏的形成虽距明季尚远，但视黄梅山为安庆戏曲滥觞之一，则又毋庸置疑。

安庆师大方锡球先生认为，黄梅戏属于“中国乡村音乐剧”，发展、兴盛于安庆地区，20世纪方初具雏形。明代戏曲评论家潘之恒《亘史·杂编叙曲》云：“云间（上海）倾六朝之艳，而皖上（安庆）与之颉颃矣。”阮家班所搬演的戏剧，从存世的阮大铖《牟尼合》工尺谱看，实际上是昆山腔，与黄梅戏采用的声腔、腔调完全不同。“剧种”是一个当代概念，“戏曲声腔，三十年一变”，地方戏曲的兼收并蓄，最终让位于剧种对声腔的固化。但是，这些并不意味阮自华对晚出的黄梅戏没有影响。

戏曲是文化精英的产物，民间有称阮自华为“安庆戏剧鼻祖”或“皖江戏剧鼻祖”。阮自华的影响力，其实在阮大铖之下。由于《明史》的定性，阮大铖长期淡出人们的视野。阮自华是阮大铖的叔祖，年龄则只长十余岁。阮大铖不仅操持家班，更集戏剧编、导、演于一身，为中国戏剧史所罕见。阮大铖、阮自华所代表的阮氏家族文化，构成了安庆戏曲源流不可或缺一环，也将安庆戏曲提升到国家文化形态的高度。

文化意义上的阮自华，是安庆戏曲文化的一个标识。《阮氏宗谱》记载，阮自华卒葬于黄梅山。寻觅良久，终无所获。蒋南才老人回忆，上个世纪兴修龙凤水库，附近的墓碑多被用于修坝，挖走的一块“戴帽子”大碑，是否出自阮自华墓，不得而知。离龙凤水库不远的农户菜地里，找到了一块碑，上面刻有“江界”二字，问及当地有无江姓居民，答曰无。历史就是这样，物是人非，但文化仍是若隐若现的风。

一个小抽屉，能放不少东西，摆放在堂中，虽然没有八仙桌那么庄重，却也让我生发一种成就感。成家后，它是餐桌，我们夫妇俩呼朋引伴打牌、喝茶，用的也是它。后来，进城买房，家具基本用不上，但我还是把这张桌子带到城里，放在复式楼的阁楼上，铺上毛毡，变成练习书法的桌子。一晃十几年过去，家庭经济状况大为好转，准备把这套老房子重新装修一下。这张四屉桌别说放在装修一新的房子里不合适，而且，经过这么些年，桌面已严重变形，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裂缝，有碍观瞻。

但这张桌子我必须留着。爱人看我心意已决，不再说什么。那天，我雇来一辆货车，货车司机一看是搬这种快要散架的四屉桌，笑着说：“这么破的一张桌子还搬走啊？连运费也不值了。”我淡淡地说：“有些东西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别看这张破桌子，它伴随我一路走来，从年轻走到年老，不舍得丢掉。”和我差不多大年纪的司机尴尬一笑：“看来，你也是一个恋旧的人。”

◆ 安庆旧影

抗战中的《怀宁抗建日报》

陈向东 文/图



多年前，我着手民国皖城安庆及所辖县域报纸实物及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我发现，山水宜人、人文荟萃的怀宁县在抗战期间曾创办过多份抗战报纸，《安庆新闻志》《安庆地区新闻志》《安庆地区志》《怀宁县志》《安庆市志》等相关志书，对报纸名称、建制、主管、发行和版面内容或回避不提，或寥寥数语，语焉不详。不久前，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并收藏到一枚“怀宁县抗建日报社证章”（见图），能为《怀宁抗建日报》正名，还原真实面目。

1939年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总则为：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则；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指导思想是：“依靠自力，艰苦奋斗，以自拨于危亡，决不稍有侥幸之念”，以抗战促进国家建设，加强国家建设支持抗战。为激发民众斗志，加强舆论宣传，县治所在地，原则上不得少于出版一份报纸。因此“怀宁抗建日报社”应运而生，其名称《怀宁抗建日报》也和有关多地抗战报纸名一致。

中共地下党员、长期潜伏在国民党桂系高层、时任民国政府怀宁县县长胡邦宪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道：“1939年，我接任怀宁县县长后，当地江镇一个叫郝忠玉（家住安庆市五当坡45号）的开明知识分子，向县政府提出开办一家以抗战为主体的报纸，这份报纸后正式发展成为《怀宁抗建日报》，我给予了大力支持，并拨给了经费，配备了编报人员，落实了办报地点，报纸出版发行后影响很大。后我又通过郝忠玉，成功策反了郝忠玉之弟，时任伪安徽省游击大队一大队大队长郝文波之部计百余名伪军起义反正。”

《怀宁抗建日报》1939年7月14日创刊，为国民党怀宁县党部编辑出版，社址在下石碑，由区楚年题名，郝忠玉任总编，四开四版，油印。该报坚持“团结、进步、抗战”的办报宗旨，弘扬民主，反对独裁，内容真实丰富，敢于为底层民众发声，全面支持抗战，发行范围遍及怀宁县境内及皖西南地区。由于亲共，一直受国民党顽固派打压。所幸，在胡邦宪撤职调任后，又一度得到了开明县长陶若存的支持和保护。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国民党怀宁县党部改《怀宁抗建日报》为《怀宁建国日报》，社址先设在安庆市天台里，后迁到安庆孝肃路42号，报社社长为郝忠玉，报社有自己的印刷厂，报纸四开四版，日报，发行数百份，为怀宁县机关报。1949年8月，中共怀宁县委将其接管后，正式更名为《怀宁县报》。



◆ 情感微澜

一张四屉桌

徐累先

这是一张比普通八仙桌边长少了两公分的桌子，我结婚那年打的。结婚前，家里连一张吃饭的桌子也没有，只好找到堂兄，请求他给我想想办法。堂兄挠挠头，木材紧张，花钱也不一定买到合适的木材。聊着聊着，他突然带我走出家门，指着院墙岔里一段两尺来围的树段，说：“这是黄连木的，木质坚硬，本来留着自己打桌子的，你急着要用，就搬回去吧。”我兴冲冲地扛回家，找来木匠，木匠量过尺寸，摇摇头：“木料倒是好木料，也足够打一张桌子，就是长度小了一些。”他左比划右比划，和我商议：“除非依木料尺寸打，或恐能打一张四屉桌。”婚期在即，我就同意了木匠的建议。

四屉桌打好后，漆上淡黄色油漆，高度适宜，小巧玲珑，看相好，特别是四周各有一